

壹、前言

中國近代教育的西化始於晚清。同治洋務運動時雖開始興辦西式學堂，但尚未形成制度；至戊戌維新時，始有三級學制的雛形（徐宗林、周愚文，1997, pp. 166, 173）。但正式建立學制，則要到光緒 28 年（1902）¹朝廷頒布〈欽定學堂章程〉（即壬寅學制）（張百熙，2008, pp. 26-27），然實施未久，光緒 29 年（1904）再頒〈奏定學堂章程〉（即癸卯學制）（張百熙，2008, pp. 36-39）。此兩學制主要是仿效日本，間接取法歐美（徐宗林、周愚文，1997, pp. 175, 178）。張百熙與張之洞先後主導兩學制的制定。仿日之議，早見於光緒 27 年（1901）張之洞與劉坤一會奏之〈興學育才摺〉，兩總督比較各國學制後，建議仿效日制（周正雲，2010, p. 18）。光緒 28 年初，張之洞（1991, p. 136）致函管學大臣張百熙，特別強調「日本學制，尤為切用」，建議他派員考察日本教育。於是張氏派吳汝綸考察日本教育，他對兩學制的影響成為學界關注的議題。

吳汝綸（以下簡稱吳氏），字摯甫，安徽桐城人。同治 4 年（1865）進士，授內閣中書。曾任曾國藩、李鴻章幕府，又任深州知州、天津府知府、冀州知州。光緒 15 年（1889）辭官後，應直督李氏之請，主講保定蓮池書院，任內創東西文學堂，併中西學為一治。庚子事變時險因此遭難，辛丑議和成，欲南歸（李景濂，2002, pp. 1128-1129）。光緒 27 年（1901），張百熙奉命重啟京師大學堂，次年他於〈奏舉吳汝綸為大學堂總教習摺〉稱讚先生：「學問純粹，時勢洞明，淹貫古今，詳悉中外。足當大學堂總教習之任」（張百熙，2008, p. 28）；又讚說：「主保定蓮池書院多年，生徒化之，故北方學者以其門稱盛，允為海內大師，以之充大學堂總教習，洵無愧色」（張百熙，2008, p. 28）。吳氏雖堅辭，但奉諭旨賞加五品卿銜派充大學堂總教習，不得已則請允先赴日考察學制再到職，以報張百熙盛情。當年 5 月初出發，9 月下旬回國後，先返皖辦學堂擬隔年再北上就職，但不幸於光緒 29 年（1903）初病逝（吳闈生，2002, p. 1160；姚永概，2002, p. 1146）。

前人研究（汪婉，1998；阿部洋，1990；胡國勇，1996；熊賢君，2006）指出兩學制受日本影響，但較早提出吳氏赴日考察影響兩學制的制定，應是日人阿部洋 1987 年的〈向日本借鑑：中國最早的近代化教育體制〉，他說吳氏考察日本後出版的《東遊叢錄》是消息來源之一（阿部洋，1990, p. 98）。之後有人討論他東遊經過（汪婉，1998；施培毅，1995），又有多人論及他對兩學制的影響（王鳴，2000；呂順長，2012；汪婉，1998；周慧，2004；胡國勇，1996；趙建民，1999；衛道治，1998；鄭德新，2009）。田正平（1996, pp. 300-309）討論考察學務熱及其影響時，謂吳氏綜合考察所得提出教育改革的兩步構想：救急辦法與長遠之策，而認為他對兩學制做出建設性貢獻。但前述研究對考察過程與重點，以及吳氏如何認識日本

¹ 本研究採陰曆。

制度，則多缺詳細說明。且論斷考察結果影響兩學制制定的證據，故均待再檢討。

再者，從比較教育的角度言，晚清此種透過教育考察學習外國制度的作法，正與同時西方比較教育發展第二階段教育借用時期的情形類似。當時各國政府對任命或選派官員分赴國外考察教育事業，深具濃厚興趣。但其有一根本錯誤的假定：以為所有的教育完全可以抄襲模仿（楊國賜，1975, p. 5）。晚清在學習日本時是否有同樣的毛病，之前諸人者都未論及。且在吳氏訪日前半年，羅振玉已率團赴日考察，其結果對吳氏有無影響，也未見討論。

因前人種種不足及吳氏考察正值清廷引進西式學制的關鍵時刻，有必要再對考察與晚清學制建立實際影響程度做更細緻探討。以下依序說明其訪日前對西學及日本教育的認識、訪日經過與發現、考察結果影響程度的再評估及結論。

貳、對西學與日本教育的認識

吳氏雖是進士出身、桐城古文大家，但不像其他遊日官紳，訪日前對洋務、西學及日本是一無所知或帶有偏見。而是早在行前，他對西學與日本教育已有所認識。茲簡述如下。

一、對西學的認識

吳氏對於西學的接觸與認識，茲分三方面說明之。

首先，他任曾國藩、李鴻章幕府時，即協辦洋務，涉中外大疑大計，兩人均諮詢其意見，有關奏疏多出吳氏之手，並協助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（李景濂，2002, p. 1128；姚永概，2002, p. 1144）。《日記》卷六〈時政〉首篇同治6年（1867）即記與各國通商情況（吳汝綸，2002c, pp. 365-366）；卷七〈外事〉，錄同治8年至光緒27年間（1869-1901）所聞或所遇外事（吳汝綸，2002c, pp. 478-514）。另他喜接納外人與歐美名士，林樂知、李提摩太皆樂與交（吳闈生，2002, p. 1159）。

其次，他對西學及西式教育的留心，始於協辦洋務，如《日記》卷八、九〈西學〉錄有所聞及所讀西學（吳汝綸，2002c, pp. 515-656），範圍極廣，內容涉及工農科技、地理、動植物學、醫學、數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經外交、法律軍事等。另曾讀嚴復所譯赫胥黎《天演論》並為作序（施培毅，1995, pp. 87-88）。而卷十〈教育〉，除訪日紀錄外，還錄所聞日、法、美、英教育情況（吳汝綸，2002c, pp. 657-686）。又〈與陸伯奎學使書〉中，分列建議中小學堂需讀西學書目（吳汝綸，2002a, pp. 376-377）。

第三，他主持蓮池書院時，用新學倡導士子，先後設西文與東文學堂，聘英教士貝格稱、日人中島裁之為師（吳闈生，2002, pp. 1158；李景濂，2002, pp. 1128-1129）。庚子事變後，在北京另設東文學社，生徒達百餘人（吳汝綸，2002a, p. 370）。

由此可知，吳氏雖是舊學出身，但思想並不保守，在經世濟變理念下，對西學有一定的認識與期待。